

附文：关于控制的社会

I. 历史

福柯将惩戒的社会定位于 18 和 19 世纪，其于 20 世纪初达到顶峰。这些社会采用禁锢大环境的组织形成。个人不间断地从一个封闭环境到另一个封闭环境，每个封闭环境都有其规则，首先是家庭，其次是学校（“你不是在家里了”），再次是军营（“你不是在学校里了”），再次是工厂，时不时是医院，也有可能是最佳禁锢环境的监狱。监狱充当了典型。《欧洲 51 年》的女主人公看到工人时惊呼道：“我好像看到了囚犯……”福柯非常精辟地分析了禁锢环境的理想设计，这种设计在工厂里尤为明显：集中，分布空间，排列时间，在时空中组合成一种其结果大于各组合分力之和的生产力。然而福柯同样知道这一式样的短暂性：它接替了目的与功能全然不同的绝对统治的社会（取消生产甚于组织生产，决定死亡甚于管理生活）。过渡是渐进的，拿破仑似乎促成了这种从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的巨大的转换。但是惩戒也碰到危机，新的力量渐渐出现，二战后加剧；我们的社会已不再是惩戒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已停止是惩戒的社会。

我们处于监狱、医院、工厂、学校、家庭等所有禁锢环境的普遍危机之中。家庭是“内部”，像所有其他的内部，如学校内部、职业内部等等，一样处于危机状态。主管部长们不断地宣布被假定为必要的改革。改革学校，改革工业，改革医院，改革军队，改革监狱，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机构垮了，或迟早要垮。

现在只不过是处理其临终事宜和给人们找点事情干干，直至正在找上门来的力量立下足来。控制的社会正在取代惩戒社会。“控制”一词是伯勒用来指新魔鬼的，福柯认为此词指明了我们最近的未来。保罗·比里尼奥也在不断地分析着这些貌似自由的、超快捷的控制形式，这些形式正在取代运作于封闭系统的旧有的惩戒形式。用不着引征特殊药物的制造、核形成、遗传学实验，虽然这些都是用来介入新过程的。不必问哪种制度最残酷，或是最可容忍，因为在每种制度中，自由与奴役都在交锋。例如，在作为禁锢环境的医院的危机中，分区化、日间医院、上门治疗，等等，最先表现出了新的自由，但是同时也就加入了堪与最严酷的禁锢相提并论的控制机制。用不着感到恐惧或抱有希望，只需要去寻找新的武器。

II. 逻辑

个人所经历的不同关禁状态或禁锢环境是自变量：人们每次都被认为是重新从零开始，所有这些环境的共同语言是存在的，但是类似的。而不同的控制状态则是一些不可分割的变化，形成一种其语言是数字的（不一定是两进制的）可变几何系。禁锢是模子，是清晰的模塑品，而控制是一种调制，像一种连续的、每时每刻变化的、自动变形的造型，或像一种每个网孔点都在变化的网筛。这在工资问题上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工厂是一个主体，它使其内部力量达到一个平衡点，这一点是尽可能高的生产点和尽可能低的工资点；在一个控制的社会里，企业代替了工厂，而企业是一种灵魂，是一种气体。毫无疑问，工厂已经有了奖励系统，但是企业则更为彻底地推行一种对每一工资的调制，使每一工资都在可笑至极的挑战、比赛、讨论等不断的转换之中进行变化。之所以连最愚蠢的电视游戏也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功，就是因为这

些游戏恰当地表现了企业的境况。工厂使个人形成一体，这对劳资双方都有好处，资方易于监视整体的每一成分，工会便于整体的抵抗。但是企业则不断地将不可调和的竞争作为有益的竞赛引进来，竞争这一绝妙的激励手段使个人之间对立，使个人本身分裂。“按劳取酬”的工资调制原则不可能不使国民教育本身受到诱惑。事实正是如此：正如企业替代工厂，经常性培训有替代学校的趋势，连续测验有替代考试的趋势。

在惩戒社会，人们不断地重新开始（从学校到军营，从军营到工厂），而在控制社会，人们永难了解任何事物，企业、培训、服务是同一调制的可转换和并存的状态，如同一个万能变形器的可转换和并存的状态。处于两种社会交接处的卡夫卡曾在《诉讼》一书中描述了最可怕的司法形式：（在两种禁锢之间的）惩戒社会的“表面了断”和（持续变化的）控制社会的“无限拖延”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司法生活方式；我们的法律之所以犹豫不决，其本身之所以处于危机状态，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前者而进入了后者。惩戒社会有两个极：表明个人的签名和表明其在整体中位置的登记号。在惩戒社会中，这两者从来不是“不相容的”，而权力同时是整体化和个人化的，也就是说，权力将其治下的人们组成一体并塑出此整体每一成员的个性（福柯从教士的牧人权力上面看到了这双重关注的根源——羊群和每只单个的羊，但是民事权力后来也用其他的手段成为市俗的“牧师”）。在控制社会则相反，至关重要的已不再是签名和登记号，而是数字，数字是一个识别口令。惩戒社会却是用口号来调整的（无论是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抵抗的角度来看）。数字构成了控制的数字语言，数字表示存取信息或是弃绝信息。人们不再面对整体一个体这一偶对，个体变成了“可分体”，整体变成了样品、数据、市场或“银行”。钱也许最能表现两种社会的区别：惩戒社会一直与铸币相关

联，这种铸币包容作为计量本位的金子；而控制则与浮动兑换相关联，浮动兑换是使不同货币样本的百分比作为数字介入的调制。古老的货币的鼯鼠是禁锢环境的动物，而货币的蛇则是控制社会的动物。在我们现在生活的制度中，但是也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和我们同他人的关系中，我们从一种动物过渡到另一种动物，从鼯鼠过渡到蛇。惩戒社会的人是能的断续生产者，而控制社会的人则更应该说是纳入轨道的、载在持续集束上的波。“冲浪运动”无处不取代古老的“体育运动”。

使一些类型的机器与一种社会相应是很容易的，这并不是因为机器是决定性的，而是因为机器表现出那些能够产生并使用机器的社会形式。古老的绝对统治社会使用简单机器，使用杠杆、滑轮、钟表；最近的惩戒社会装备有能学的机器，而与之俱在的是被动性的熵的危险和主动性破坏的危险；控制的社会则采用了第三类机器：信息机器和电脑，其被动性的危险是干扰，主动性的危险是电脑犯罪和病毒的引入。这是技术的变化，更深刻地说是资本主义的变化。这种已为人所知的变化可以综括如下：19世纪的资本主义是集中状态，是为了生产，并与所有制相关。它在禁锢的环境中设立工厂，资本家固然是生产手段的所有者，但也可能是其他类似环境（工人住宅区，学校）的所有者。至于市场，或是通过专业化而获得，或是通过殖民化而夺得，或是通过生产成本的降低而取得。然而，在当前的形势下，资本主义不再是为了生产，它往往将生产，甚至将纺织、冶金和石油等这些复杂形式的生产扔给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这是超生产的资本主义。它不再购买原材料和出售成品，它购买成品或购置零件。它想卖的，是服务；它想买的，是股份。这不再是为了生产的资本主义，而是为了产品、即为了销售或市场的资本主义。因此，从根本上说，它是分散的，工厂让位给企业。家庭、学校、军队、工厂已不再

是聚向一个所有者——国家或私人势力——的明显类似的处所，而是仅有几个管理者的同一企业的可变形、可转换的数字图形。甚至艺术家也脱离封闭环境而进入银行的开放流通线路中。对市场的占领是通过对控制权的掌握，而非通过惩戒教育；是更多地通过对行市的确定，而非通过成本的降低；是更多地通过产品的转化，而非通过生产的专业化。贪污贿赂在这里具有了新的力量。销售成为企业的中心或“魂”。人们告诉我们，企业有一个“魂”，这真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消息。营销学现在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并培育着我们的主人——这厚颜无耻的一代。控制是短期和迅速轮换的，但也是持续和无穷尽的，而惩戒是长期、无限而断续的。

人不再是被禁锢的人，而是负债的人。资本主义确实将三分之二的人类的极端贫困作为常数保留下来：控制不仅将要面对边界的消耗，还将要面对贫民窟或少数民族集中区的爆发。

III. 程序

无需科学幻想便可设想一种控制机制，这种控制机制每时每刻都在指明开放环境中一个成分的位置，指明一个保护区中动物的位置，指明一个企业（电子圈）中人的位置。费利克斯·加达里想象了这样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其（个人的）电子卡离开其居室、街道和社区，这张电子卡可使某个栏杆抬起；电子卡还可以在某天或者在某个时间内被吐出；重要的不是栏杆，而是电脑，它测定每个人合法的或不合法的位置，进行着普遍的调制。

控制机制一出现就受到重视，对控制机制的社会技术研究应该是范畴性的，并描绘出什么东西正在取代众人皆称其处于危机的惩戒社会的禁锢环境。很可能借自绝对权力社会的古老手段还会重新登台，但它们必定经过适当的改造。重要的是，我们正处

于某种事物的开端。在“监狱制度”中，人们在寻找至少是对轻罪的“替代”刑罚，在使用电子圈强迫被判刑者在某一时刻留在家中。在“学校制度”中，正在出现持续测验的形式，正在实行经常性培训，正在放弃大学内的一切研究，正在将“企业”引入学校的各个层面。在“医院制度”中，正在出现既无医生也无患者的“新医学”，它摆脱了潜在病人和招至风险的对象，它完全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表现出一种向个人化的进展，而是以“可分体”的控制方式用数字代替了个体。在“企业制度”中，对钱、产品和人进行着新的处理，而不再通过工厂这一形式。这是一些并不很重要的例子，但是它们可以使人更好地理解人们所说的机构危机，明白一种新的统治制度正在逐渐地、分散地建立起来。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工会的无所作为：在其整个历史中都与反惩戒斗争或与禁锢环境中的斗争相联系的工会，将能够适应抵抗控制社会的新形式呢，还是将让位于这些新形式？能够进攻春风得意的营销学的这些未来形式的雏形，人们是否已经抓住了呢？许多青年人都莫名其妙地要求“受激励”，他们要求受培训和受经常性教育，现在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发现人们正在把他们当成什么，就像他们的兄长不无困难地发现了惩戒的目的性。蛇的环节比鼯鼠的洞更为复杂。